

目 录

稿 约

高风亮节堪楷模

——党的好儿女鲍华同志革命的一生

.....市政协文史组 (1)

广州大革命亲历记.....杨青山 (12)

广东历史悠久的侨校之一——甄贤学校

.....苏鼎常 (23)

钟宝的史料及其轶闻

.....何志毅 唐仕进 (38)

解放前香洲的工商业.....管荣光 (44)

吴健彰其人.....李大节 (54)

解放战争时期中山地区的地下交通

.....梁泰猷忆述 世敬执笔 (57)

新发现的杨匏安烈士的两首佚诗

.....史 敬 (64)

珠海近代最早的官费留学生

.....唐仕进 (66)

林则徐巡视澳门.....林世敬 王丽英 (70)

唐家共乐园小史

.....梁志坚 (76)

高风亮节堪楷模

——党的好儿女鲍华同志
革命的一生

市政协文史组

一九八四年，是党的好儿女鲍华同志（一九一——一九六四）逝世的二十周年。鲍华同志原为旅日华侨，一九二九年在日本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后返澳门创办濠江中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带领“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”，回内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，其后又在四会、三水、曲江、乳源等地从事武装斗争和地下革命活动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赴香港创办报纸，后参加北江人民武装部队，坚持武装斗争到解放。解放后，他担任了北江公学副教育长，后任韶关师范学校校长。一九六四年逝世，终年五十三岁。

鲍华同志从事革命几十年，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。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，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，后驱逐出境；他在乳源从事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两次驱逐出县。在党内，他因曾一度与党失去联系而中断组织关系八年，又因受错误的处理而先后两次失去党籍。无论遇到多大的曲折，鲍华同志总是对党对革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而积极从事党的工作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党的实

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和发扬，鲍华同志的冤案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得以彻底平反，恢复了党籍和名誉。与他一起斗争和工作过的战友、他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党组织，近年来撰写了大量关于他革命活动的材料，对他的革命精神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鲍华同志虽然逝世了，但他那高尚的革命品质和情操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

踏上革命的征途

鲍华同志原籍为广东省香山县白石乡（今属珠海市前山区白石乡），乳名金桥，在日本时改名兆华，也称包华，后来先后又改名雁坡、哲魂，笔名列昂。鲍华同志的父亲鲍昌，别号善常，世居家乡，青年时旅日本，在横滨某洋行任职，一九二九年冬回家乡开设一间小商店，后赴澳门经商，抗战时期在澳门逝世，回葬白石乡。生母周氏，生有三子，长子即鲍华同志，次子金男，三子金晓。继母生有两子三女：长子金池，（即鲍华同志的四弟，三十年代后期随同鲍华同志参加革命，改名雁清，解放后在《南方日报》工作，现已离休；）次子金明，长女名桃、次女名杏，三女名细妹。

一九一一年鲍华同志出生于家乡白石村。六岁时生母去世，接着，他随父亲旅居日本横滨市，十三岁开始，在一间商行当童工，从此独立生活。鲍华同志幼小刻苦好学，六、七岁时，就经常捧着启蒙识字教科书，向邻居请教，在横滨当童工时，尽管工作辛劳，仍勤奋自学汉文。

一九二七年，年仅十七岁的鲍华同志，在横滨中华会馆工作。当时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，相当流行，鲍华同志

接触了三民主义，其爱国忧民的思想，受到很大的启迪。后来，他又通过阅读其他进步报刊，了解到国内军阀连年混战、民不聊生的状况，对所谓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产生了怀疑。此时，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空前发展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，工人阶级的罢工和示威活动，对鲍华同志的思想启发很大。一九二八年，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，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，深深地感动了他。这时，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，在海外仍然坚持斗争，广州起义时的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潘兆璠同志，于起义失败后，受党的指派，赴日本参加中共日本总支部领导工作，并在横滨成立了党支部，开展马列主义宣传工作。至此，鲍华同志开始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，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渐形成。起初，他加入了日本进步华侨青年组织的“黎明社”，散发过反对蒋介石的传单，后来，他又加入了中共党的外围组织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，接受党的领导，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。通过党的教育和鲍华同志的自觉学习，鲍华同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地提高，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希望，因此，鲍华同志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兆华”，以示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之意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，鲍华同志经潘兆璠同志的介绍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从一位旅日华侨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。同年秋天，日本当局发动了大规模迫害旅日华侨和留学生事件，鲍华同志被捕入狱。

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，鲍华同志备受酷刑拷打，身体遭受摧残，但他立场坚定，坚贞不屈，绝不向日本当局低头。一九三〇年秋，鲍华同志被日本当局无理地递解出境，

返回澳门，他的父亲也随同他离开日本，回到家乡白石村，鲍华同志也从此失去了与党的联系。

在澳门的日子里

初回澳门的鲍华同志，人地生疏，生活难于着落，有时返回家乡，又因白色恐怖严重，只能秘密往返。他失去了与党的联系，心情十分苦闷彷徨，他改名“雁坡”，把自己的处境喻为离群之雁，表示了自己对党的怀念之情。他曾一度赴香港，在一间鲜鱼栏做工，与同自己在日本入党、被捕入狱、递解出境的谭洪同志邂逅相逢，但不久又因生活所迫，返回澳门，过着报贩的生涯。在这颠沛流离的生活中，鲍华同志绝不忘记自己是一位共产党员，时刻希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，一九三一年，他终于找到了党，认识了澳门地下党员黄新英同志，为了争取青年，发展革命力量，他与黄新英同志一起，筹办了一间濠江中学，几经艰辛筹措，这间中学于同年秋成立开学。

当时的澳门，人口只有十多万，风气腐败，纸醉金迷，烟赌遍地。在教育方面，教会办的圣若瑟、圣罗撒中学，华人办的崇实、振华、复旦等中学，都具有殖民化、封建化的色彩。鲍华同志创办的濠江中学，坚持以爱国主义、民族解放的思想教育学生，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，参加社会爱国活动，在教学方面，认真传授知识，启发学生认识现实，追求真理的思想，这些教学措施，大大冲击了守旧落后的意识，学校面目为之一新，受到了社会正直人士和学生家长的赞许。

“九·一八”、“一·二八”事件发生后，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，轰轰烈烈地开展，广大爱国的澳门同胞，也参加了这一运动的行列。鲍华同志以濠江中学为据点，组织师生教唱救亡歌曲，排演抗日话剧，并举办“国耻周”纪念活动，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。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爱国同胞的热忱，鲍华同志又创办了一间“学生书店”，出版“学生杂志”，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。他在当时较为公允的《大公报》副刊上撰写文章，又与广州的林锋同志等创办了一份《南国青年》小报，使用“列昂”的笔名，呼吁广大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随后，鲍华同志发动了濠江中学一批比较积极的学生，与廖锦涛同志（中共地下党员、岐关车路公司澳门站职员）发动的部分汽车行业职工，共同组织了一个“绿光剧社”，经常到附近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一九三七年“七·七”事变前夕，鲍华同志又与陈少陵同志（原为马来亚的中共党员，暴露身份后转移到澳门，开了一间“小小书店”，作为活动地点）一起，组织了“救国会”，由是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人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，开展革命活动和抗日斗争。经过鲍华同志等六、七年时间的艰苦工作，澳门成了我党团结广大爱国同胞、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的一个根据地，为以后“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”的组建和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打下了基础。

为营救抗日青年而斗争

“七·七”事变发生后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，正式开

始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，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。鲍华同志认为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不会有什么阻挠，打算率领部分澳门抗日青年，回内地参加救亡斗争。为了取得联系，鲍华同志返回了广州，会见了杨康华同志（当时化名虞焕章），康华同志介绍他与“艺协”的张村、李冲同志认识，共同研究发展工作。就在这时，由澳门抗日青年组成的“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”（如下简称“旅澳服务团”）已由中共澳门地下党负责人余美庆同志组建完成，并经请示香港我党负责人连贯和周伯明两同志同意，准备回内地参加抗日宣传活动。服务团出发之前，鲍华同志接到来信，要求速返澳门，于是他离开广州，取道香港赶回澳门。在香港时，鲍华同志会见了连贯同志，连贯同志认为澳门干部缺少，要他留在澳门，不要跟随旅澳服务团返回内地，于是他与廖锦涛同志回到澳门，来往于广州、香港之间，担任“旅澳服务团”的后方工作。

一九三七年十月，“旅澳服务团”全体成员六十人，从澳门出发，奔赴内地，经江门、新会、到达台山，沿途演剧唱歌，街头演讲，编贴标语漫画，刊登墙报，有时到学校教唱救亡歌曲，向乡村自卫团人员作时事报告，讲授游击战术，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。同年十二月三十日，“旅澳服务团”抵达台山县城，台城的国民党当局，竟派出便衣侦缉，将他们全部拘捕，解送广州的广东绥靖公署军法处，后又因押到南石头监狱（即所谓“惩教场”）。鲍华同志获悉这个消息，即找到了杨康华同志研究，决定向社会公布事件的真相。接着，鲍华同志奔赴香港，向连贯和周伯明同志汇报，商定营救措施。首先，由郭沫若同志在港主办的《救亡日

报》发表了消息，进行呼吁；接着，香港、澳门各家报纸纷纷转刊消息，给予响应；不久，上海“全国救国会”负责人沈钧儒、章乃器、沙千里、王造时、史良等发出通电，敦促余汉谋（当时任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、集团军司令）释放“旅澳服务团”全体成员。国民党当局在正义的压力下，被迫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，将“旅澳服务团”全体成员释放。“旅澳服务团”返回澳门，边活动边休整，扩大了组织，于同年八月，又出发到中山县一带开展救亡活动。

鲍华同志忍耐着与党失去组织关系八年之久的痛苦，顽强奋斗，积极工作，取得同志们的尊敬和党的重新信任。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在余美庆同志的介绍下，他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鲍华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将自己的名字“雁坡”改为“哲魂”，表示了自己的思想与党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，紧紧依存的感情。

转战四会 立足乳源
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广州沦陷敌手。“旅澳服务团”由于经费支绌，经党组织的批准，决定解散，成员返回内地，参加抗日队伍，直接从事抗日武装斗争。部分成员由陈少陵、鲍华同志带领，回到四会县，加入了当时驻四会的广东税警总团（后改编为“暂八师”）政训处政训大队，受到政训处长田竺僧的重用，鲍华与陈少陵同志一起被任命为上尉视察员。一九三九年一月，政训处中共地下支部成立，陈少陵同志任书记，鲍华同志任宣传委员。三月，中共西江特委决定将政训处党支部升格为特别支部，陈、鲍两同志仍任原职。

五月，陈少陵同志随田竺僧调往三水，鲍华同志接任特支书记。在这段时间内，鲍华同志在中共四会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，积极组织特支党员，在税警总团和四会县各地深入开展抗日工作，并在政工队员和农村青年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，党员人数从十多名发展到三十七名，为四会地区的抗日工作和党组织力量的壮大，作出了贡献。

一九三九年十月，中共西江特委在四会、三水开展“肃托”斗争，解散了中共政训处“特支”和三水“特支”，鲍华同志在这个错误斗争事件中，被内定为托派，遭受清洗，开除党籍。

一九四〇年一月，日寇进犯清远，税警总团奉命抵抗。此时，鲍华同志虽被错误处理，但仍以大义为重，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已，同政工队员一起，组织救援队，奔赴前线，英勇作战，完成了支前任务，受到了爱国官兵和群众的赞扬。

一九四〇年四月，税警总团改编为暂八师，鲍华同志离开暂八师，经乐昌、曲江，进入乳源，一面宣传抗日，一面寻找党组织。不久，他经《新华南》杂志负责人袁祯园同志的介绍，在乳源文教馆任干事，后到乳源县立第一小学（后改名乳源县云峰镇中心小学）任教。乳源地处山区，经济、文化较为落后，当时全县连一间中学都没有。鲍华同志从一九四一年开始，四处奔走，动员有识之士，兴办教育事业，他亲自谒见县政当局，提议创办乳源中学。经过他辛勤的努力和地方人士的赞助，乳源中学于同年秋季开办，鲍华同志也被聘执教三年。在乳源中学任教期间，鲍华同志积极依靠思想进步的学生，组织课外读书会，并在学校创立了党领导

的民主同盟。在鲍华同志革命思想的熏陶下，乳源中学大批学生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迄今，这些学生每当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时，总是念念不忘他们的引路人——“鲍老师”。鲍华同志的名字，在现在的乳源县，仍然是家喻户晓。

一九四四年十月，鲍华同志组织乳源中学学生，反对国民党当局在学校动员学生报名参加青年军的所谓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运动，取得了胜利，从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。同年十二月，国民党当局无理地宣布，将鲍华同志驱逐出乳源县。鲍华同志在进步学生的掩护下，仍然留在乳源县境。不久，他身患重病，在他的学生文丹（后随鲍华同志参军、入党）家中，调治月余。一九四五年三、四月，日本侵略军逼近乳源，国民党军政部门纷纷撤出，中小学均告停课，鲍华同志举办了一个补习班，坚持抗日宣传，并借以维持生活。日寇侵占乳源后，鲍华仍在乳源坚持斗争，直到日寇投降，他又返回乳源中学任教。

一九四五年十月，党在乳源建立了组织。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同志，派邝哲民和潘达同志（潘兆璠同志之子）审查了鲍华同志的表现，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。离开党的身边六年之久的鲍华同志，又一次回到了组织的怀抱。

奋斗不息 正气永存

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，国民党的军队又开回了乳源。在经过一阵子的“劫收”（即所谓“接收”）后，国民党当局开始对革命和人民民主运动进行镇压，他们始终不放过当年有“异己思想”而驱逐出县的鲍华同志，一九四六年二月，

鲍华同志又一次被驱逐出乳源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，鲍华同志到了香港，办了一份《论坛》小报。他运用了大量的事实，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黑暗的本质，宣传我党民主和平的主张。一九四七年八月，他返回东莞县虎门中学任教，同年十月，他受华南分局的派遣，回到粤北，任北江第一支队青工班负责人，政治部宣传科科长，北江革命干部学校负责人，直接参加武装斗争，直至全国解放。

解放以后，鲍华同志被任为北江公学副教育长，后任韶关师范学校校长。进城以后，鲍华同志仍然保持着革命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，克勤克俭，谦严谨恳地工作。在担任师范学校校长期间，他坚持党的教育方针，团结广大教师和学生，共同致力教育、教学改革，引导师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使这间学校成了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单位。

一九五四年八月，鲍华同志以“托派”和“自首叛党分子”的罪名，又一次被清除出党，韶关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，也一同撤消，他的爱人冯昭仪也受到了株连。鲍华同志一再坚信自己，坚信党组织，把每月应交的党费储存起来，等待恢复党籍时一起缴交。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五日，鲍华同志因患肺癌，在广州逝世，弥留时唯一的遗嘱，就是要求组织弄清自己的问题，恢复党籍。身后遗下一子一女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党中央在政治上、组织上全面拨乱反正，鲍华同志生前的战友、学生，纷纷向上级党组织提出，弄清鲍华同志的问题，刘田夫、梁威林等领导同志，亲自向党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，请求平反鲍华同志的冤案，对鲍华同志的一生做了充分的肯定。党组织坚持实事求是

是，重新审查了他的问题，一九八一年九月，中共韶关市委作出平反决定，否定了鲍华同志叛徒、托派等问题，恢复了党籍和名誉，肯定他是党的好党员、好干部，他的爱人原在广州一〇三中学任教，现在省社会主义学院工作。

鲍华同志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是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一生，是光荣的一生。

（苏鼎常执笔）

广州大革命亲历记

杨青山

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，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场斗争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。从二十年代起，我在堂兄杨匏安（革命烈士）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，参加了这场斗争。当年的斗争壮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应省市有关部门的要求，我将这场斗争的所见所闻做些回忆，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。

（一）

座落于广州越华路旧省长公署左侧的“杨家祠”，是中共党广东支部的所在地，是广东革命的一个指挥所。“杨家祠”原是我们北山村（今珠海市南屏区北山乡）在科举时代，给乡里学子赴省应试住宿的场所（俗称试馆），它是一座宽敞而雅静的房子。房子分内外两进，中有天井相隔，两旁有走廊相通。两进房子均有一房一厅，另有小楼阁。外厅可容二十多人，里厅可容四十多人，房子右侧有一座副斗，也有一房一厅。房子门口的空地种着两棵十米高的梧桐树，

与大街连着一条三十多米的甬道。自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谭平山等在素波巷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后，就将这个小组的所在地设在杨家祠。当时匏安兄全家和我都住在这里。匏安兄也是广东党的领导人之一。谭平山、谭植棠经常来这里与匏安兄商讨工作。此后广东党员增加了阮啸仙、刘尔嵩、张善铭、谭天度、冯菊坡、梁复然、王寒烬、杨殷、杨章甫等。他们经常来这里集会，有时达三四十人。此后，在党中央工作的瞿秋白、刘少奇、张太雷、李立三、穆青、高君宇、彭述之等，也来过杨家祠开会，指导广东党的工作。瞿秋白同志曾在这里教唱《国际歌》，并有一个时期讲授社会科学，刘少奇同志在这里报告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经过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，广东的工人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。广东党积极在工人中发展党组织，在铁路系统组织了十人团，以李连、李甫、陆枝为中坚分子。在石井兵工厂，依靠陈日祥、罗珠、郑沃、张桥等骨干，展开革命斗争，曾一度揭露兵工厂厂长马超俊贪污渎职，虐待工人的罪恶，迫使当局撤销其厂长职务。油业、机器、建筑等工会也领导工人开展增加工资、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。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，海陆丰、佛山、广宁、花县及西江、西南路地区的农民纷纷掀起抗租热潮，反抗地主豪绅的压迫、剥削。负责农运的同志如彭湃、林骚、何友述、黄学增、周其鑑、陈道舟、吴勤、李华照等，经常到杨家祠汇报工作，使得这里不论白天黑夜，都是你来我往，十分热闹。当时，我中国共产党还是半公开的组织，为了加强掩护，党还在这里举办了一个“注音字母讲习所”，由杨章甫讲授。

(二)

我自小就跟鲍安兄一起生活，当时的名字叫杨广。鲍安兄的革命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当时我年纪尚小，虽然未参团参党，但我早已踏上革命道路，开始，我首先做的是交通联络和传递革命讯息的工作，在广州每天都为鲍安兄送革命文章到第七甫《中华新报》刊登，中央和各省的同志来到广东，我作向导。记得有一位山东来的同志杨明斋，我经常为他向导传话，他和我很要好。广东向中央汇报情况文件，都由我带往邮局投递，寄往上海的文件，都写上“商务印书馆编译局沈雁冰转钟英（中共中央代号）收”。后来，我进入了广东高等师范附中学习，一边学习一边帮助党做些工作。一九二三年六月“广东新学生社”成立了，我便参加了这个组织，它是中共领导青年运动的一个公开组织，社址设在广州市司后街某号。该社的骨干，如阮啸仙、刘尔嵩、张善铭、周文雍、周其鉴、黄居仁、杨善集等都住在该社。它的主要任务是联络青年学生参加社会活动，进行革命工作。就在这一年的秋，阮啸仙介绍我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当时的广东大学（高等师范改名，后又改为中山大学）及其附中的团员中，还有赖玉阔（赖先声）、兰格业、丁愿、洪剑雄等人。

一九二三年六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。这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，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，协助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。一九二四年一月，国民党召开了第一

次代表大会，国共合作正式实现。黄埔军校创办后，鲍安兄要我入黄埔军校，但鲍安兄的母亲不同意，因我是独子，五岁丧母，我母亲临终时托她照顾我。她认为做军人危险性大，所以反对。后来鲍安兄想送我去苏联学习，与蒋经国、廖承志、陈复（陈树人之子）等人一起赴莫斯科。但她仍不同意而作罢。这个时期革命工作繁多，正在用人之际，鲍安兄就要我出来工作，晚上让我去广东大学专修班学习。当时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，分别由谭平山、杨鲍安任部长和秘书，很多实际工作由杨鲍安负责，于是鲍安兄把我安排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，帮助他颁发党证。就在这一年，我由谭平山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我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一段时间，不久组织上又把我调往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工作。代表团的所在地在东山恤孤路的春园。春园有三幢楼宇，我的工作地点在第二幢第二楼。代表团的总代表是鲍罗廷，一切政治、军事、经济问题他都有决定的权力，他外出时常有张太雷同志跟随，充当翻译。军事代表为加伦将军，他很有将才，当征东军攻打惠州陈炯明残部杨坤如时，需要多少兵力，几天可攻下，他都有预见，结果不出所料。后来回苏联充当远东红军总司令。同我一起工作的共有五个人，除了我以外还有包惠僧和他的爱人夏松云，一个岭南大学毕业生负责翻译和打字，另外还有一位安南同志，叫做李瑞。他是代表团的英文秘书，懂得中、英、法、俄四国文字，参加了第三国际，既是苏联共产党员，也是中国共产党员，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，化名王山而（王先生）。我的办公枱同他对面，直到解放后，我才知道他就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同志。我们的任务是收集

各地农工运动的情况，编写油印作汇报。春园三幢房子除我们以外其余都是苏联人。有加伦将军、马马耶夫及夫人和李糜。马马耶夫的夫人会说几句中国话，他有空常来教我们学俄语。有一天从海参崴开来一艘苏联的轮船，装有很多军用物资，有日俄战争时期用过的步枪等，这批物资是苏联赠给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的，当这艘船到黄埔后，我们曾被邀请到船上参观。谭平山、陈延年、杨匏安等都去了。苏联同志跳着俄国舞欢迎我们，我们就高兴地唱起了革命歌曲，苏联同志还请我们品尝了他们特制的黑面色。

一九二五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，我便被调到中央农民部当特派员，派驻中山县。当时这个县很混乱，一班地主、土豪劣绅组织了一个竞进社，横行乡里，欺压群众，打家劫舍，无恶不作，民愤极大。为了肃清这股恶势力，广东革命政府派出了陈铭枢部队一个团兵力，由副团长方薰率领，开赴中山，我和罗绮园（农讲所主任）亦一同前往，驻防在这股恶势力猖獗的溪角乡一带。经过十多天调查，我们拘捕这股恶势力的骨干份子一百多人。经逐个审讯，把罪恶昭彰的镇压了十多人，地方群众莫不额首称庆。地方也安定下来。在这段期间我和原驻中山的农运同志李华照，黎炎孟、苏南、梁九等分赴各乡，广泛接触农民群众，进行宣传教育工作，启发农民懂得为什么农民终年劳碌，不得温饱，而军阀、地主、资本家不耕不作，却好吃好住，花天酒地，穷奢极欲的道理。使他们认识到这都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制度所造成。农民只有和工人联合起来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才能得到翻身解放，建立一个平等、自由、富裕的社会。经过一段时间，调来的部队回防去了，没有肃清的地方